

满文官刻图书述论

黄润华

满文刻本图书可以分为官刻和坊刻两大类。本文专门讨论官刻图书。从满文创制到清代灭亡的三百多年中，满文官刻图书的起源、发展、鼎盛、衰落的各个阶段，本文试图作一分期和描述，并对其兴亡盛衰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满文刻书的滥觞

公元1599年，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创制满文后，用满文记录了大量上谕、公文、函件等档案文献，这就是后世称之为《满文老档》、《国史院档》等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反映了满族在关外的社会生活，其中许多史料为汉文文献所不载，对研究满族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及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在关外用满文撰写的文献从未刻印过，只有稿本、抄本传世。

关外时期，用满文翻译了很多汉籍。从努尔哈赤崛起建州之初，随着与明王朝关系的发展，汉籍的满译便开始了。努尔哈赤本人通晓汉语文，能阅读《水浒传》一类的汉文书籍，并聘有一位汉族文人作为自己的幕宾，因此他对汉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他下令翻译汉籍，译者便是被称为满族圣人的达海。达海九岁读书，精通汉文，他对老满文作了改进，除了翻译汉籍外，还负责翻译、缮写对明和朝鲜的文书，用汉语文传宣诏旨。^①

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继承汗位，对“文治”尤为重视。他在天聪三年（1629）上谕中说：“自古国

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是年四月，分定儒臣职责：“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②儒臣职掌既定，也有了工作场所，便产生了一个机构“bithei boo”，汉文音译为“笔帖赫包”，意为“书房”。天聪六年易名为“bithei Yamun”，音译为“笔帖赫衙门”，但整个天聪年间，汉文仍以“书房”称之，到乾隆时修订《清太宗实录》嫌“书房”过于俚俗，方改为“文馆”。

达海有了四名笔帖式作为助手，不停地从事汉籍的满译工作。“其平日所译汉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帙”。到天聪六年（1632）七月，达海“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未竣而卒。”^③天年不永，时方三十八岁。达海之后，宜成格又译了《礼部会典》等书。^④

天聪九年（1635）五月，清太宗令将辽宋金元四史择要译出，翌年十一月，金世宗史译成，清太宗御翔凤楼召诸大臣宣读。

据史料所载，清朝在入关前所译汉籍有十余部之多。这些书籍译出后，以何种形式流传，有无专门的刻书机构，因无史料记载，又无当时的刻本存世，所以难有确说，但根据一些迹象推断，当时应有满文刻本图书刊印。

昭槤在《啸亭续录》中讲：“文庙（按指清太宗）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既是“颁赐耆旧”，恐难以一一抄写，还是刻板印刷最为方便。那末，清朝在入关前有无刻书业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有当时的汉文与蒙文刻本存世。汉文刻本名为《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此书约刻于天命三、四年，

残本，存23页，每页八行，行12字，字体拙朴，纸张粗糙，书名
为后人所加。尽管此书残存23页，但书页所载刻工有8人之多，
说明当时有一批专人从事刻书。

蒙文刻本有《军律》一书存世，此系崇德三年（1638）八月
二十二日颁布，前缺，存19叶，每叶框高22cm，长17cm，高丽
纸木板印刷。根据其内容和蒙文文字等特点，确认此书为清入关
前刻本。^⑤

既然在入关前，后金已有了汉文和蒙文的刻本，那末作为满
族自己的文字，如果没有满文刻本，那倒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只
是没有保留下来。其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战争环境，最重要的原因
是刊印量极少。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东征西战，以马上得天下，所谓
以“神武开基”，充满了尚武精神，但对文化却颇为鄙视。天聪
六年，相公胡贡明说：“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的事，反
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⑥在这种教育事业落后，文化水
平低下的社会环境中，刻书业自然不能发展。当时汉籍译成满文
后，多采用由内弘文院大臣向诸王贝勒、固山额真及其他大臣宣
读的形式来传播。

此外，刻书业也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刻书印书需要质量较
好、数量较多的纸张，而纸张恰恰是后金国十分紧缺的物资。当
时纸张来源主要是在战争中缴获明朝地方政府的各式公文纸，其
次是得自朝鲜的进贡。在《李朝实录》中屡屡有赠礼“雪花纸一
百卷、白绵纸五百卷”、“霸花纸二千卷”等记载。这些纸张主
要用于祭祀和书写往来公文及记事。从流传至今的《满文老档》
的用纸来看，有的写在明代的旧公文纸上，如兵丁花名册、《大
明会典》的书页上，有的写在长短不一，厚薄不等的高丽纸上。

《满文老档》是内三院“记载国史”的档案，用纸尚且如此，当
时后金纸张匮乏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除纸张外，刻书业还需要其他物资，如笔、墨、木板、刻刀、绫绢、丝线等，这就需要更丰富的物资基础和较发达的手工业作为保障，而当时这些条件还难以具备。因此，关外时期只是满文刻书的滥觞时期。

二、满文官刻图书的发展

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军进入北京，从此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满文刻书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顺治年间满文书已出现了少数坊刻本，如听松楼刻印的《诗经》等，但是以内府刻本为主。

顺治三年（1647）刊印了辽、金、元三史，这是清入关后首次刊印的满文图书，也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满文刻本。这三部书分别为8、9、14册，书框高26.5cm，宽19cm，每叶八行，包背装。其书译者为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等人。希福在天命年间即投后金，因兼通满、汉、蒙三种文字，被置文馆，赐号巴克什，是清初重要的满族文臣。早在天聪九年（1635）五月，清太宗谕令文馆诸臣将辽宋金元四史内“有关紧要者据实录译成书，用备观览。”次年，希福等人即开始翻译，至崇德四年（1638）告成，顺治元年进呈御览，赏赉有差。顺治三年祁充格等人刊刻成帙。据李德启先生研究，此三书为汉文三史中之本纪部分。

顺治三年还刊印了一部满文图书，即是《洪武宝训》（一名《洪武要训》），这是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敕译的。《东华录》载：“上以宝训一书深裨治理，御制序文颁行中外。”辽金元三史在关外已经译讫，《洪武宝训》是入关后翻译的第一部汉籍。借用刚刚被推翻的明朝的开国皇帝的训词来教训满洲贵族，以巩固建立不久的全国性政权，这本身颇耐人寻味。

顺治七年，又刊印了《三国志演义》满译本。《三国志演义》早在关外曾由达海译过，入关后，遵摄政王多尔袞谕旨，由大学士祁充格等组织重译。参加翻译的有查布海、索那海、伊

图、霍力、庆泰、来袞、何德等七人，祁充格、范文程、刚林、冯铨、洪承畴、宁完我、宋权等满汉官员总校。全书24册，分装6函，每半页9行，框高29cm，宽20.5cm，包背装。清朝入关前后，两次翻译《三国志演义》，并非因其为文学名著，实以此书为兵略。清“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颇多得力于此。”^⑦直到乾隆年间，名将海兰察为奖励部下额勒登保，还以满文《三国志演义》授之，勉其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⑧

顺治八年，皇帝亲政。此时，十四岁的福临虽学了满文，但对汉语文不甚熟悉，所以“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于是发愤读书，五更起读，博览群书，苦读九年，对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元明戏曲话本无不涉猎，^⑨对汉族文化愈加熟悉。这个时期以皇帝的名义撰写、编纂了一批宣扬儒家思想的书籍，并往往以满汉两种文本同时刊印，如《勤学文》（顺治十年）、《御制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十二年）、《御纂内政辑要》、《太上感应篇》（顺治十四年）等。顺治一朝约刻18部满文图书。

清朝入关后，为了适应汉籍满译工作的需要，专设翻书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择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⑩直到咸丰年间仍有此机构。翻书房将汉籍译为满文后，即付刻印。顺治年间，宫内刻书还是利用明朝的刻书机构经厂。经厂设在西安门内，明代归司礼监掌管，嘉靖年间刻字、刷印等各类工匠已达1200多人，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印刷厂。清初在经厂刊印了不少图书，当时内府刻书，仿明经厂本式样，如满文辽金元三史及《三国志演义》，均是大开本，包背装。从满文文字看，顺治年间刻本的字体刚劲古朴，字里行间尚有老满文的残存风韵，与康熙刻本的字体有较明显的区别。

三、满文官刻图书的繁荣

公元1662年，玄烨以八岁冲龄继承帝位，是为康熙皇帝。

他在位六十一年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强大封建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得到全面恢复和较大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又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康熙皇帝本人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融满汉两种文化为一体，对西方科学技术也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提倡经学、史学、文学，“留意典籍，编定群书”（《清圣祖实录》语），除按例编修《实录》、《圣训》等书外，他还组织班子编纂经、史、文等方面的图书，促进了皇家刻书业的发展，满文官刻图书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康熙时代皇家刻书业发展的一个标志是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武英殿修书处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隶属于内务府，专门编撰和刊印宫内编纂的各种图书。据统计，武英殿修书处从建立到清末，共整理、校注、辑佚、汇编古籍和编纂新书达七百余种，其中半数刊刻成书。^①武英殿修书处的建立，给中国版本学上留下了一个专门的名词——殿版，为中国古代出版史增添了光彩的一页。满文的内府刻本也得以崭新的面貌问世。这时期满文的殿刻本变得更加规范，字体典雅，有些图书用开化纸大字印刷，纸张洁白细腻，字体墨色匀润，装帧精美考究，有一种特殊的宫廷特色。

康熙一朝大约刊印了二十多部满文图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经书 有清一代，自太宗、世祖起，均尊孔崇儒，到康熙时，更是把崇儒尊道作为文化国策。康熙帝亲政后，廷请宿儒大臣进行日讲，从康熙十六年（1677）开始陆续刊印了《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等书，康熙帝亲自为之撰写序言。他本人提倡经学、理学，晚年命李光地编了《性理精义》十二卷，于康熙五十六年译成满文刊印。

（二）政书 清朝在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权以后，各项行政

法规制度逐渐建立健全，统治经验也日渐丰富。康熙帝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治法”，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下令编撰《清会典》，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完成。全书共162卷，所载内容自崇德元年（1636）起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止。《清会典》修纂的目的是“用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⑫。是清朝行政法规的大纲，它的编纂反映了清政权的巩固和成熟，为以后的修典奠定了基础。

康熙时期修纂的重要满文政书还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九年）、《刑部新定现行例》（康熙十九年）、《太祖圣训》（康熙二十五年）、《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八年）等。这些政书在当时有很强的实用性，并为康熙后各朝提供了典范。

（三）语言文学 这部分图书种类不多，但所编印的几部本身规模宏大，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语言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御制清文鉴》。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上谕礼部侍郎傅达礼：“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后生子弟渐生差谬。尔任翰林院，可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应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益于后学。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期永远可传，方为善也。”^⑬此书前后经三十五年方告完成，这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满文分类词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军事、礼乐、饮食、器物等共280类，一万二千余条，附有总纲（即索引），为满文译学中第一部纲领性巨著。这部辞书开了清代编纂官修辞书的先河，乾隆时期编纂的各类清文鉴无不以此为楷模。康熙四十九年（1710）在此辞书基础上增加了蒙文，名《满蒙文鉴》。

文学类图书的代表作品是《御制古文渊鉴》。这是一部古代散文汇集，全书包括自春秋迄唐宋文章共693篇，分六十四卷，由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徐乾学等奉敕编纂，康熙二十四年（1685）武英殿刻本，有汉、满两种文本。汉文本用彩色套

印,美仑美奂,体现了当时最高印刷水平。满文本虽无彩色印刷,但印制也相当精美。书长24.2cm,宽16.1cm,开化纸棉白细软,字体端庄,墨色鲜亮,装帧考究,是康熙时代皇家满文刻本的典范。就其内容而言,《古文渊鉴》是清代大规模翻译汉族古代散文的第一部集子,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后如道光年间译的《古文观止》,咸丰年间的《翻译古文》都受到这部书的启发,但它们的内容和规模远不及《古文渊鉴》。

康熙年间的满文刻本中,有一些书其官刻特征不很明显,但根据种种迹象,可以判断不是坊刻而是官刻,甚至是内府刻本。如“七本头”,这是包括《黄石公素书》、《莱根谭》、《孝经》、《御制三角形论》、《性理一则》、《醒世要言》、《潘氏总论》等七种图书的一函丛书。这部书开本较小,用纸普通,也没有用“御制”作为总书名,但从内容看,《黄石公素书》是达海在关外所译,经和素校后刊印的,《御制三角形论》更是皇帝本人的数学论文。“七本头”的辑译者是和素,这是一位清初重要的翻译家,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编“七本头”的官衔是“供奉皇太子讲读、领缮书处、武备院员外郎”,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官至“武英殿总监造、管翻书房、原内阁侍读学士、今佐领加二级”的高位。由这位直接掌管皇家翻译出版机构的官员亲自编译、所含内容又有“御制”文章的书,很难想象会到坊间去刊印。如果细看书的装帧,小开本的“七本头”每册书脊两端均有黄绫装裱,足证其为官装无疑。

另外一种书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印的满文《金瓶梅》。此书向被列为“诲淫”之作,顺治、康熙两朝屡有上谕明令严禁“淫词小说”,在这种氛围下,《金瓶梅》居然能译成满文并刻板印行,在文网盘结的当时,如果不得到特别允准是不可能的。这部小说的满译者众说纷纭,有和素说、徐元梦说、康熙帝之弟说等几种。^④不论是何人,肯定都是达官贵族。《金瓶梅》满译

本有一篇序，其中说道：“因其立意为戒昭明，是以令其译之，余于儿暇参订焉。”可见此书之翻译是序作者之意，其地位又高于译者，故曰“令其译之”。尽管序作者与译者一样亦未留名，但无疑也是当权的满洲贵族中人。由此可以推断，《金瓶梅》满译本最有可能是官刻本。

雍正年间，满文官刻图书继续发展，但这个时期，满文官刻本的种类与数量都显得较为单调、稀少。从种类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政书，如《大清律集解附例》、《吏部铨选官员则例》、《吏部处分则例》（以上均为雍正三年刻本）、《大清会典》（雍正十年刻本）等。另一类是雍正帝的言论文章，如《圣谕广训》（雍正二年）、《雍正上谕》（雍正二年、十年）、《朋党论》（雍正二年）、《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等。

尽管这一时期满文官刻本不多，但在内容上也反映出雍正年间政治上的一些特点。如胤禛即位之初颁布的满汉文《朋党论》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对旗务奏议的上谕，反映了削弱王公旗主权势，加强皇权统治的一个侧面；而成为煌煌巨著的雍正上谕则勾勒出这位“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⑤勤政有为的帝王形象。

四、满文官刻图书的鼎盛

公元1735年秋，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逝世，和硕宝亲王弘历即皇帝位，是为乾隆皇帝。进入乾隆时代后，满文官刻图书也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期。乾隆六十年中，内府所刻满文图书，无论从内容、数量和书品上看，都超过了前三朝，乾隆后历朝亦未有出其右者。据初步统计，乾隆一朝满文官刻图书约有五十种左右，从内容上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重新整理翻译儒家经典。《诗经》早在顺治年间已经翻译，康熙时期，四书、《易经》、《书经》、《孝经》等一批

儒家经典都译成了满文，或以“日讲解义”的形式刊布。乾隆帝即位后，认为有的译本如《诗经》因翻译过早，一些词语为《清文鉴》未收，不很规范；有的译本如《易经》，一些卦名象象的翻译“对音乏旧，未尽繙意”，为了“嘉惠来学”，“不留余憾”，下令对一批儒家经典重新翻译。乾隆帝对译文十分重视，自称“几余复为折衷是”，“每分帙进呈，丹毫涂乙，不惮往复之。”^⑧这样，四书（乾隆六年）、《书经》（乾隆二十五年）、《易经》（乾隆三十年）、《诗经》（乾隆三十三年）、《礼记》（乾隆四十八年）、《春秋》（乾隆四十九年）等一批儒家经典译作相继问世。

（二）继续编纂刻印太宗、世祖、圣祖和世宗等历代皇帝的《圣训》。除世宗的“圣训”为乾隆五年编纂外，其余几位皇帝的“圣训”早已编就，于乾隆年间陆续刊印。

（三）加强政书的修纂。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大清律例》的修订。《大清律》最初制定于顺治三年（1646），当时清王朝刚定鼎北京，诸事待举，急需一部法律，但时间所限，只能“详译明律，参以国制”来应急。康雍两朝，屡加修订，经过近百年的总结、完善，到乾隆五年（1740）命大臣对清律详悉参订，重加编辑，并以满汉两种文本刊布。其后又陆续刊布了《大清律续纂条例》、《大清律续纂条例总类》。

《大清会典》是乾隆时期修订的另一部规模宏大的政书。《清会典》最初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雍正年间又用了十年时间进行修纂，乾隆帝即位后，针对康雍两朝所修会典中的一些舛讹疏漏，于乾隆十二年（1747）下令重修，对重修会典的目的、要求、体例作了明确指示，并要求稿本缮成一二卷后，即行陆续呈奏，而不用康雍两朝那种“全帙告竣，一并进呈”的办法，可见乾隆帝对此书的重视，乾隆二十九年（1764）《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满文本刊布。

乾隆一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加强了建制立法，对各项规章制度广为编纂，不断修订。除上述两部大型律典外，一批则例也相继问世。如《八旗则例》、《吏部则例》（乾隆七年）、《兵部督捕则例》（乾隆八年）、《旗务则例》（乾隆三十四年）、《国子监则例》（乾隆三十七年）等。一些则例不断修订，如《八旗则例》初刻于乾隆七年，后于二十九年、三十七年、三十九年、五十年分别续修。这些则例不断修订，反映了乾隆时期的法规制度不断补充完善，是清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强化成熟的标志。

（四）重视史书的编修。乾隆帝在即位前就熟读史书，深知“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所以对史书的编修十分重视。从康熙年间开始，每次用兵之后，都要成立专门机构，将有关军事行动的谕旨奏报编纂成集，是谓“方略”。乾隆一朝，用兵较大规模者有十次之多，乾隆帝因之自号“十全老人”，他仿照康熙纂修方略、纪略，译成满文的有《平定准噶尔方略》（乾隆三十五年）、《平定金川方略》（乾隆四十五年）等。此外还用满文刻印了《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乾隆二十九年）、《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开国方略》（乾隆五十一年）、《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乾隆六十年）等历史图书。

（五）关心满文工具书的编纂。乾隆帝为了加强满族的统治基础，针对当时八旗官员及其子弟久处太平，骄逸自安，汉化程度日益加深，对满洲旧俗逐渐淡忘的现实，特别提出了“骑射我朝根本”、“清语尤为本务”，规定将清语骑射作为满洲举人会试、官员升黜和宗室王公承袭爵位的条件。在这样一个总政策指导下，乾隆帝亲自指导编纂了一系列满文、满文与其他语文相对照的工具书，同时对满文进行整理规范，为满文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成的《御制增订清文鉴》，这是在康熙朝编的《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增订的，比

《清文鉴》增加了新词4700余条，比原书增加了约二分之一，并将全部辞条译成汉文。后在《增订清文鉴》的基础上，又发展到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后者仅有抄本）。^{①⑦}又如《西域同文志》（乾隆十五年完成），此书把中国西北地区的地名和一部分人名用汉、满、蒙、藏、托忒蒙文、维等六种文字对照汇编，是研究清代西北地区地理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

（六）注意满文大藏经的翻译。有清一代，把崇奉喇嘛教列为国策，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蒙藏地区，保障清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乾隆帝在《喇嘛说》碑文中说得十分坦率：“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康熙两朝先后将甘珠尔、丹珠尔译为蒙古文，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谕开始翻译满文大藏经，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告成，历时十八年。乾隆帝将翻译满文大藏经与编纂四库全书等同看作是其六旬后办的两件大事。满文大藏经全部108函，梵夹装，朱印本。可惜这部经藏当时印刷不多，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北京故宫收藏的76函残本。所幸这部大藏经的经板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仍保存在故宫内。乾隆时期还翻译刻印了其他一些佛教经典，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刊印的《大藏全咒》及《皈依经》、《普贤行愿品经》等。乾隆帝本人也亲自译过一些佛经，如《吉祥偈》、《金刚经》等。可以说，满文佛经的刻本绝大多数都是乾隆朝翻译刊印的，这些佛经或是作为供奉，或是供皇家寺庙中喇嘛唸诵，散入民间的很少。北图收藏的满文佛经刻本大多是民国初年从清东西陵皇室家庙中收集来的。

满文官刻图书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原因。一是经过百年的发展，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日益巩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形成了所谓“盛世”景象，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其二是在乾隆时期，封建中央集权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统治阶级取得了丰

富的经验，许多法律、政令的制订、修改反映了皇权的加强。当时在清政府统治机构中，满洲官员仍占主要地位，各类满文图书特别是实用性很强的政书有较大的需求量。再者是乾隆帝本人的作用。这位皇帝本身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特别对汉文化的了解与吸收都达到了相当深的程度，而他本人又有着十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理，在他“稽古右文”、提倡清语骑射的政策指导下，满文图书的撰修、翻译、刻印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五、满文官刻图书的式微

清代自嘉道以降，国力衰微，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满文官刻图书也逐渐式微，最后变成一种官方的点缀。嘉道咸三朝的六十多年中，除了依照惯例编纂刊印上一代皇帝的“圣训”外，只刻印了《理藩院则例》（嘉庆二十二年修，道光二十九年重订）、《回疆则例》（道光二十二年印本）等满文政书，续纂了《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分别刻于嘉庆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咸丰九年），此外并无新书问世。到同光时期，官方所修满文图书，大多只以稿本、抄本留了下来。

满文官刻图书发展到顶峰后迅速跌入低谷，进入式微阶段，除了乾隆朝以后，政治腐败，内乱不止，帝国主义的人侵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历史因素外，与当时满语文使用面急剧缩小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满族入关后，处在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与汉族的接触更加密切，并全面接受了汉文化。在语言文字方面，使用汉语文愈加普遍，到乾隆时期有很多满族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已黯然无知了。这种演变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符合语言发展变化规律的。语言融合在历史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两个民族在日益交融的情况下，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的民族所持的语言会逐渐取代人口较少、经济文化欠发达的民族语言，至于是否在政治、军事上处于统治地位并非是决定因素。这

种语言融合往往是通过双语现象来完成的，持将被取代语言的民族学会了新的发达民族的语言，开始了双重语言的过渡。新学会的发达民族语言在社会交际中逐渐占了主要地位，直到最后终于取代了该民族原有的语言，于是，双语现象结束，语言融合告成。恩格斯说：“在长期的征服中，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留的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采用了他们的语言。”^⑧可以说，到乾隆朝以后，满族基本上结束了双语阶段，逐渐过渡到统一使用汉语文的新时期了。乾隆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保持作为统治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使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不致动摇，提出国语骑射为清朝根本，并用行政手段来保证这一国策的推行，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乾隆帝一死，这种人为的努力很快就失效了。从嘉道咸三朝所刊印的几种满文政书看，不论是《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还是《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都是仅与蒙古回部等少数民族有关的，当时负责处理蒙古、回部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都是以满、蒙民族的官员为主，所以尚有阅读满文本的需要，而在其他政府部门，再也见不到满文刻本的政书了。这种变化实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所反映的民族语言的同化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只要不是以暴力或藉助于特权进行的民族的任何同化，都是值得欢迎的。^⑨

有清一代，满文官刻图书可以说是由皇家统揽刊印的，只是到清代中叶以后，在一些地方长官衙署才有刊印之举。如嘉庆二十三年，西安将军署刻印了《清文指要》，广州将军衙门和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在光绪年间也刻印了《清文总汇》、《清语辑要》等书，这些地方官署刊印的都是学习满文的教科书和工具书，以满足当地呈小聚居状态的八旗子弟学习满语文的需要。

六、结语

清代把满语尊为“国语”，赋予它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满文官刻图书为一大批满洲官员所需要，有其实用性的一面，同时也有政治上所需要的象征性、特殊性的一面。因此满文官刻图书与清王朝的产生、发展直到康乾盛世的顶峰以及后来的衰落、消亡是相依相连的，它的发展史就是清王朝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和折光。在满洲崛起于白山黑水以来的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满文官刻图书便是其中一块闪烁异彩的瑰宝。中国历史上有限几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中，清王朝所遗留下来的本民族的文化典籍是最丰富的，留给后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们应当很好地整理、研究和利用它。

附：满文官刻图书知见目录

顺治朝：

辽史 八卷 希福等译 满文 顺治三年（1646） 八册

金史 九卷 希福等译 满文 顺治三年（1646） 九册

元史 希福等译 满文 顺治三年（1646） 九册

洪武要训 六卷 刚林等译校 满文 顺治三年（1646） 六册

三国志 二十四卷 陈寿撰 叶成额等译 宁完我等校 满汉合璧

顺治七年（1650） 二十四册

三国志演义 罗贯中撰 祁充格等译 满文 顺治七年（1650） 二十四册

劝学文 清世祖（福临）撰 满文 顺治十年（1653） 一册

诗经 二十卷 满文 顺治十一年（1654） 十册

顺天乡试录 满文 顺治十一年（1654） 一册

顺天乡试题名 满文 顺治十一年（1654） 一册

中式满蒙进士录 满蒙合璧 顺治十二年（1655） 蝶装 一册

中式满蒙举人题名 满汉合璧 顺治十二年（1655） 蝶装 一册

范行恒言 清世祖（福临）撰 满文 顺治十二年（1655） 一册

劝善要言 清世祖（福临）撰 满汉合璧 顺治十二年（1655）、

十三年(1656) 各一册

人臣儆心录 清世祖(福临)撰 满汉合璧 顺治十二年(1655)
二册

资政要览 四卷 满世祖(福临)撰 满文 顺治十二年(1655)
四册

进士登科录 满蒙合璧 顺治十二年(1655) 一册

表忠录 清世祖(福临)撰 满文 顺治十三年(1656) 一册

牛戒 清世祖(福临)撰 满文 顺治十三年(1656) 一册

寿诗 清世祖(福临)撰 满文 顺治十三年(1656) 一册

太上感应篇 满文 顺治十四年(1657) 十二册

内政辑要 二卷 清世祖(福临)撰 满文 顺治十五年(1658) 二
册

董后行状及哀册 清世祖(福临)撰 满汉合璧 顺治十七年(1660)
四册

医疗通书 满文 六册

孝经 满文 一册

康熙朝

大清律集解附例 三十卷 刚林等撰 满文 康熙九年(1670) 十册

大学衍义 四十三卷 真德秀撰 满文 康熙十一年(1672) 三十六
册

定南大将军兼多罗贝勒尚善致吴三桂约战书 尚善撰 满文 康熙十
三年(1675) 一册

日讲四书解义 二十六卷 喇萨里 程廷经总校 满文 康熙十六年
(1677)二十六册

日讲书经解义 十三卷 库勒纳等撰 满文 康熙十九年(1680) 十
三册

刑部新定现行例 二卷 黄机等撰 满文 康熙十九年(1680) 二册

日讲易经解义 十八卷 牛钮等总校 满文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十八册

出使交趾纪事 鄂黑撰 满文 康熙二十二年(1683) 一册

古文渊鉴 六十四卷 徐乾学等编 满文 康熙二十四年(1685) 三

十六册

大清太祖高皇帝圣训 四卷 满文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四册

大清会典 一百六十二卷 伊桑阿等编 满文 康熙二十九年(1690)
一百四十一册

资治通鉴纲目 一百一十一卷 和素译 满文 康熙三十年(1691)

九十一册

清凉山新志 十卷 罗卜藏丹巴撰 满文 康熙四十年(1701) 十册

醒世要言 四卷 吕坤著 和素译 满文 康熙四十三年(1704) 一册

黄石公素书 张商英注 达海译 和素校 满汉合璧 康熙四十三年
(1704) 一册

潘氏总论 潘荣著 阿什坦译 满汉合璧 康熙四十六年(1707) 一册

菜根谭 二卷 洪应明辑 和素译 满汉合璧 康熙四十七年(1708)
二册

孝经 和素校译 满汉合璧 康熙四十七年(1708) 一册

清文鉴 二十五卷 满文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十册

范忠诚公文集 四卷 范承模著 满文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四册

金瓶梅 兰陵笑笑生著 满文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四十册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四十八卷目录一卷 温达等编 满文 康熙四十
八年(1709) 四十九册

宁寿宫万寿记载 满文 康熙四十九年(1710) 一册

避暑山庄诗 二卷 清圣祖(玄烨)著 满文 康熙五十年(1711)
一册

性理精义 十二卷 李光地编 满文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八册

满蒙文鉴 二十九卷 拉锡等编 满蒙文 康熙五十六年(1717) 二
十九册

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 清圣祖(玄烨)撰 满汉合璧
一册

雍正朝

丧葬婚嫁之礼仪 礼部拟订 满汉合璧 雍正元年(1723) 一册

圣谕广训 清世宗(胤禛)撰 满文 雍正二年(1724) 二册
朋党论 清世宗(胤禛)撰 满汉合璧 雍正二年(1724) 一册
雍正上谕 清世宗(胤禛)撰 满文硃印 雍正二年至四年(1724—

1726) 七册

吏部处分则例 四十七卷 满文 雍正三年(1725) 十六册
吏部铨选官员则例 四卷 满文 雍正三年(1725) 四册
孝经 满文 雍正五年(1728) 一册
孝经集注 清世宗(胤禛)厘定 满文 雍正五年(1727) 一册
庭训格言 二卷 清世宗(胤禛)撰 满文 雍正八年(1730) 二册
军令 满汉合璧 雍正九年(1731) 一册
大清会典 尹泰等编 雍正十年(1732) 存二百四十七册
内则衍义 十六卷 清世祖(福临)撰 满文 雍正十三年(1735)

八册

上谕旗务议覆 允禄等编 满汉合集 十二册
上谕八旗 允禄等编 满汉合集 二十册
和硕怡贤亲王行状 张廷玉撰 满汉合璧 二册
异域录 图理琛著 满文 四册

乾隆朝

日讲春秋解义 六十四卷 满文 乾隆二年(1737) 三十二册
大清太宗文皇帝圣训 六卷 满文 乾隆四年(1739) 六册
大清世祖章皇帝圣训 六卷 满文 乾隆四年(1739) 六册
八旗通志 二百五十卷 马齐等撰 满文 乾隆四年(1739) 一百三十三册

大清世宗宪皇帝圣训 三十六卷 满文 乾隆五年(1740) 三十六册
大清律续纂条例 二卷 来保等撰 满文 乾隆五至七年(1740—1742) 二册

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 六十卷 满文 乾隆六年(1741) 六十册
四书 鄂尔泰等译 满文 乾隆六年(1741) 六册
谕行旗务奏议 允禄等编 满汉合集 乾隆六年(1741) 十三册
八旗则例 十二卷 鄂尔泰等编 满文 乾隆七年(1742) 四册
中枢政考 三十一卷 鄂尔泰等编 满文 乾隆七年(1742) 十八册

盛京赋 清高宗(弘历)撰 鄂尔泰等辑注 满文 乾隆八年(1743) 一册

兵部督捕则例 二卷 徐本等撰 满文 乾隆八年(1743) 二册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八十卷 鄂尔泰撰 满文 乾隆九年(1744) 二十六册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六卷 允禄等撰 满文 乾隆十二年(1747) 六册

盛京赋 清高宗(弘历)撰 傅恒等缮满文篆字 乾隆十三年(1748) 三十二册

同文韵统 六卷 允禄等编 满汉藏梵对照 乾隆十五年(1750) 四册

西域同文志 二十四卷 傅恒等编 满汉蒙藏托忒蒙古维文合璧 乾隆十五年(1750) 八册;又乾隆二十八年(1763) 二十四册

书经 六卷 满汉合璧 乾隆二十五年(1760) 四册;又乾隆三十三年(1768) 四册

大清律续纂条例 二卷 舒赫德等撰 满文 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756—1760) 二册

大清律续纂条例总类 二卷 舒赫德等撰 满文 乾隆二十五年(1760) 二册

宗室王公绩表传 六卷 允祕等撰 满文 乾隆二十九年(1764) 七册

满汉合璧集要 乾隆二十九年(1764) 一册

满汉合璧选要 乾隆二十九年(1764) 一册

八旗则例 十二卷 曹诚等编 满文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四册

大清会典 一百卷 允禩等撰 满文 乾隆二十九年(1764) 二十八册

大清会典则例 一百八十卷 允禩等撰 满文 乾隆二十九年(1764) 一百四十册

中枢政考 来保等撰 满文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十八册

易经 满汉合璧 乾隆三十年(1765) 四册

大清律例 四十七卷 徐本等撰 满文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存十

八册

诗经 满汉合璧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四册

书经 满汉合璧 乾隆三十三年(1768) 四册

户部旗务则例 十二卷 傅恒等撰 满文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八册

旗务则例 十二卷 傅恒等撰 满文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四册

平定准噶尔方略 一百七十一卷 傅恒等撰 满文 乾隆三十五年(1770) 一百册

增订清文鉴 四十六卷 傅恒等编 满汉合璧 乾隆三十六年(1771) 四十八册

大清律纂修条例 二卷 刘统勋等撰 满文 乾隆三十七年(1772)

二册

清汉对音字式 满汉文 乾隆三十七年(1772) 一册

八旗则例 十二卷 福隆安等撰 满文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四册

国子监则例 三十卷 蔡新等撰 满文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四册

八旗则例 二十四卷 尹继善等撰 满汉合璧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十四册

中枢政考 福隆安等撰 满汉合璧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四十六册

蒙古源流 八卷 小彻辰萨囊台吉撰 满文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四册

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文 清高宗(弘历)撰 满汉合璧 乾隆四十一年(1776) 一册

恩封宗室王公表 永璘等撰 满汉合璧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十册

平定两金川方略 一百三十六卷 阿桂等编 满文 乾隆四十五年(1780) 一百二十册

大清律纂修条例 阿桂等撰 满文 乾隆四十七年(1782) 一册

吏部则例 七十卷 阿桂等撰 满文 乾隆四十八年(1783) 六十九册

册

春秋 六十四卷 满汉合璧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四十八册

八旗则例 十二卷 齐明等编 满文 乾隆五十年(1785) 四册

皇清开国方略 三十二卷 阿桂等撰 满文 乾隆五十一年(1786)

三十二册·

增修中枢政考 四卷 阿桂等撰 满文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四册
吏部则例 七十卷 和珅等撰 满文 乾隆六十年(1795) 六十九册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满汉合璧 乾隆六十年(1795) 一百一十册
御论(附讲章) 清高宗(弘历)撰 鄂尔泰等进讲 朱墨刻本 满文
一册

行军纪律 满汉合璧 一册

四体清文鉴 三十二卷附编四卷 满汉蒙藏分类 三十六册
(另有佛经刻本五十一种,略)

嘉庆朝

戒赌十则 九鼎译 满汉合璧 嘉庆三年(1798) 镇浙将军萨秉阿重
刻本 一册

军器则例 董诰等撰 满文 嘉庆九年(1804) 六册

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 三百卷 满文 嘉庆十二年(1807) 三百册

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四十八卷 庆桂等撰 满汉合璧 嘉庆
十九年(1814) 四十八册

理藩院则例 托津等撰 满文 嘉庆二十二年(1817) 二十四册

清文指要 五卷 富俊编 满汉合璧 嘉庆二十三年(1818) 西安将
军署重刻本 四册

道光朝

清汉文海 四十卷 瓜尔佳巴尼琿编 满汉合璧 道光元年(1821) 江
南驻防衙门刻本 二十册

御论(附讲章) 清宣宗(旻宁)撰 长龄等进讲 满汉合璧 道光三
年(1823) 朱墨刻本 一册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四十六卷 满汉合璧 道光四年(1824) 十六册

大清仁宗睿皇帝圣训 一百一十卷 满文 道光四年(1824) 一百一
十册

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七十二卷 潘世恩等撰 满汉蒙合璧
道光十九年(1839) 七十二册

回疆则例 八卷 赛尚阿等撰 满文 道光二十二年(1842) 九册

理藩院则例 五十卷 赛尚阿等撰 满文 道光二十九年(1849) 五

十册

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二十四卷 穆彰阿等撰 满文 道光二十九年(1849) 存二十二册

中枢政考 四卷 满文 四册

咸丰朝

御论(附讲章) 清文宗(奕訢)撰 满汉合璧 咸丰三年(1853) 十五册

大清宣宗成皇帝圣训 一百三十卷 满文 咸丰六年(1856) 一百三十册

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四十八卷 彭蕴章等撰 满蒙合璧 咸丰九年(1859) 四十八册

同治朝

孝全成皇后册 满文 同治元年(1862) 一册

练兵示谕 奕訢撰 满汉合璧 同治三年(1864) 一册

大清文宗显皇帝圣训 一百一十卷 满文 同治五年(1866) 一百一十册

光绪朝

四书 满汉合璧 光绪四年(1878)成都驻防八旗官学刻本 八册

大清穆宗毅皇帝圣训 一百六十卷 满文 光绪五年(1879) 一百六十册

四书 满汉合璧 光绪十六年(1890)荆州驻防翻译总学重刻本 六册
对音辑字 志宽、培宽编 满汉合璧 光绪十六年(1890)荆州翻译总学刻本 二册

成语辑要 二卷 满汉合璧 光绪十七年(1891)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 二册

单清语 志宽、培宽择录 满汉合璧 光绪十七年(1891)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 八册

蒙文汇书 十六卷 赛尚阿原编 松森等重编 满汉蒙合璧 光绪十七年(1891) 十七册

清语辑要 二卷 满汉合璧 光绪十七年(1891)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

本 二册

书经 六卷 满汉合璧 光绪二十二年(1896)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
六册

吏治辑要 高鹗撰 满汉合璧 光绪二十二年(1896)荆州驻防翻译总
学重刻本 一册

清文总汇 十二卷 志宽、培宽编 满汉合璧 光绪二十三年(1897)
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 十二册

孙子十三篇吴子六篇 四卷 满汉合璧 光绪三十二年(1906)荆州驻
防翻译总学刻本

孙吴武经 四卷 桑额译 满汉合璧 光绪三十三年(1907)荆州驻防
翻译总学刻本 四册

劝善要言 清世祖(福临)撰 满汉合璧 新疆巡抚陶模刻本 一册
宣统朝

谕哲里木盟十旗兴学劝业文 锡良撰 满蒙汉合璧 宣统元年(1909)
自刻本一册

(书目未注明刻版者均为殿刻本)

注:

①《清史列传》卷四,本传。

②《清太宗实录》卷五。

③《清太宗实录》卷十二。

④《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四十四。

⑤申晓亭:北图所藏蒙文珍本崇德三年《军律》。

⑥《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⑦⑧陈康祺:《燕下乡脞录》。

⑨木陈忞:《北游集》。

⑩昭槁:《嘯亭续录》。

⑪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

⑫《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

⑬《清史列传》卷六,傅达礼传。

⑭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文献》第16辑,1983年6月。

⑮《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九。

①⑥分见《易经》、《诗经》等满译本御制序

①⑦黄明信：《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材料》，《五体清文鉴》，民族出版社，1957年11月。

①⑧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二版第196页。

①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

《九江寿春记》成书年代小考

《九江寿春记》一书，撰者朱珔。不知卷数，久佚。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记有此书；《汉唐地理书抄》里也有清人王谟的辑本。近人张国淦在他的《中国古方志考》中，考认该书成于东汉时代，许多方志学者亦多依张氏之说。该书是寿县古志书，笔者经详细考证，认为它的成书年代应属南朝。清人南丰曾道唯主纂的光绪《寿州志·艺文志》中，载有《致陈尚书仆射徐陵求故丞相建宁公王琳首书》一文，署名“梁骠骑府仓曹参军朱珔”。笔者认为该朱珔，与《太平寰宇记》所记《九江寿春记》撰者朱珔当属一人。许多学者所说的东汉朱珔，亦即这位致书徐陵的仓曹参军朱珔。

据《南史》王琳传记说，琳，初为梁将，后入齐，镇寿阳（即寿春）。陈将吴明彻寇齐，堰肥水灌寿阳城，城陷，琳被执，杀之于城东北二十里。将琳首传至建康，悬之于市。《南史》又说，琳“果劲绝人”，“倾身下士，得将卒之心。”所以被杀后所属痛心疾首。随王琳镇守寿阳的朱珔遂致书徐陵，求将王琳首还回淮南。徐陵“嘉其志节”，便向陈主启述，获陈主允许，“与开府主簿刘韶慧等，持其首还于淮南”。从以上记述可知，这位南朝梁人朱珔，在随王琳镇寿阳之际，对于当时寿阳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风情有了一定的感性经验。《九江寿春记》一书，正是建立在这种扎实的感性经验基础上写出来的。故笔者认为《九江寿春记》的成书年代应为南朝。

· 王建国 ·